

09
上海文史资料选辑

统战工作史料专辑(十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 编

上海文史资料选辑

统战工作史料专辑(十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

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
赠

书

编辑出版

上海文史资料选辑——统战工作史料专辑(十)

编 辑	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	
出 版	文史资料编辑部	(上海市北京西路 860 号)
	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	
印 刷	上海新华印刷厂	(上海市大连路 130 号)
发 行	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	出版日期 1991 年 10 月

国内统一刊号 CN31—12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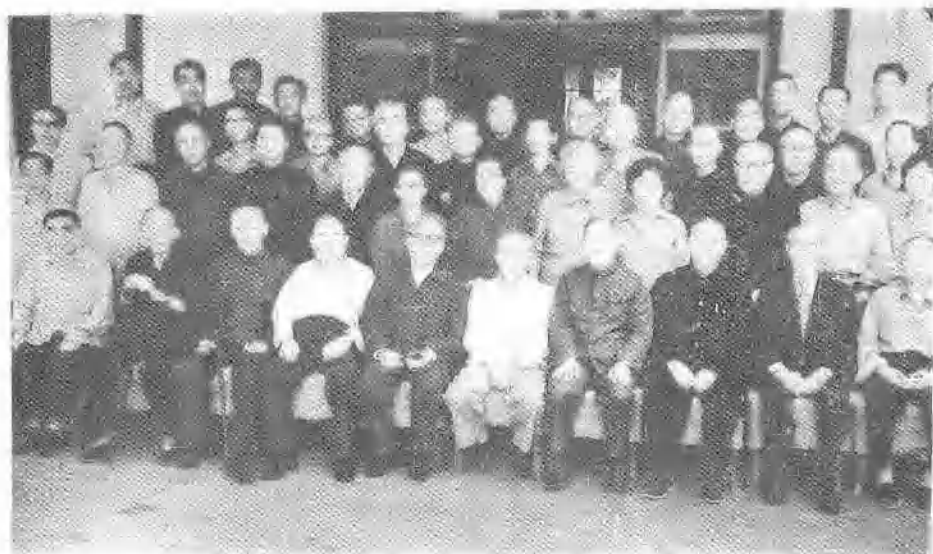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3.2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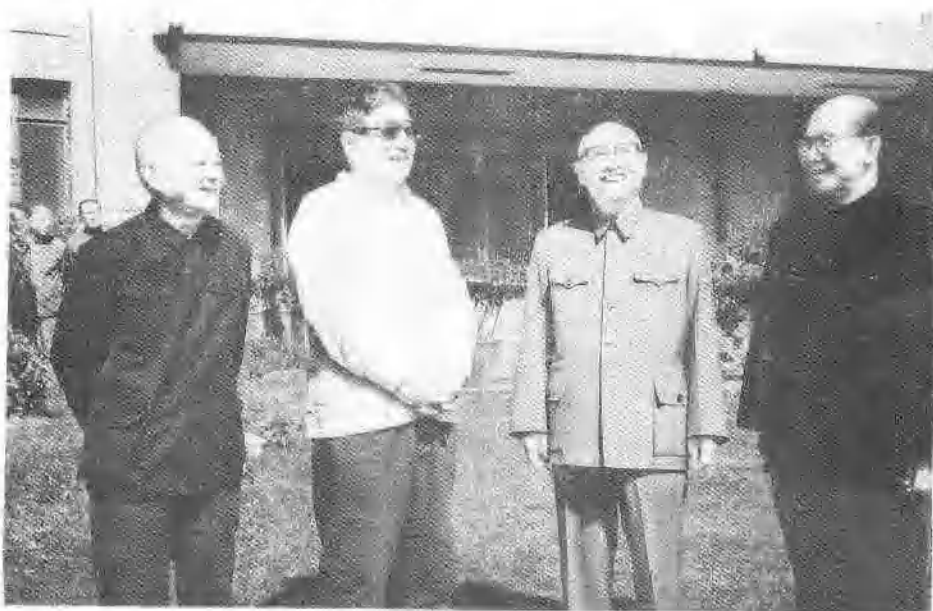
1967年7月，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中苏友协大厦咖啡厅接见各界知名人士。在座的有顾景衡（左一）、江歌（左二）、吴中一（左三）、陈锦珊（左四）、史耀康（左五）、沈西虹（前排），周面如（后排）。



毛泽东同志在上海接见熊佛四。



1981年9月,上海市各界人士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赴武汉参观团一行,在东湖宾馆前受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韩五峰(右六)第卅会见,并合影留念。在前排左侧起自左至右为:李楚村、武和平、樊雅振、胡廷秋、周善敏、陈王登、赵祖康、马耀华、唐庆春、赵超构等。



1982年10月,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杨静仁(左二)来上海,同张季岳(左一)、刘增基(左三)、陈铭珊(左四)合影留念。

1981年3月，上海市政协和本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（自左至右）赵祖惠、刘靖基、陆征帆、周谷城、马若安、谢平宗、唐君远七人赴从化等地参观。图为从化竹林前合影。



1990年5月为纪念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诞辰150周年，在复旦中学校园内举行马相伯铜像揭幕仪式。



1988年12月，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(右一)向姚慕双(左一)、周柏春(中)舞台艺术生涯五十周年祝贺时合影。



1988年上海医科大学第二医学院党委为倪葆春、王淑贞夫妇九十年华诞祝寿。自左至右为二医大党委副书记林荫亚、王淑贞、倪葆春、王乐三。

《统战工作史料专辑》(十)目录

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	许涤新(1)
解放初期统战工作在基层的实践	范征夫(18)
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工作难忘的几桩事	高飞(28)

曲折的历程 光明的前途

——四十年来我的感受	陈铭珊(40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回忆七人行	张承宗(60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黎照寰赴朝慰问吟诗	周旧邦(66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上海市协商委员会组织土改工作队和参观团经过	崔亨通(7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上海各界人士讨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盛况	黄松岗(7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上海各界人士赴武昌参观

——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	史选(84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上海市政协画室滇川之行	叶元(91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参加政协工作的几点体会	富润生(98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一老南天身是史

——纪念马相伯先生诞辰150周年	王怡白(10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吴文祺教授	邓明以(118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王应睐对生化研究的贡献	上海科技党委史料征集组(119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从事科研工作四十年的感受	王应睐(122)
怀念我的父亲天文学家李珣	李晓玉(130)
纪念《资本论》研究者漆琪生同志	黎澍维(135)
倪葆春、王淑贞夫妇献身医学四十载	王乐三(151)
为医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曹裕丰教授	傅福明(156)
怀念哥哥曹裕丰	曹宝贞(163)
为中国戏剧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熊佛西	王海波(167)
我与滑稽戏所走过的路程	周柏春(175)

~~~~~ 香港特稿 ~~~~~

“大江号”北归记	朱 钢(184)
我与浙江实业银行	孔绶蘅(195)

封 面 上海南浦大桥

本书装帧设计.....祁 珊

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

许涤新

一、团结民族资本家

为了搞好党同民族工商业家的关系，提高中上层工商业者对党和人民政府的认识，中共上海市委经过反复考虑之后，决定由我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，于8月23日下午在中国银行楼上召开工商界座谈会。这是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后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同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次正式会议。参加会议的约300人。我宣布开会后，饶漱石、陈毅和潘汉年相继讲话，解除工商界人士的疑虑，鼓励他们搞好生产经营，为恢复上海经济做出贡献。座谈会从下午二时一直开到六时，好几位代表人物争着发言。我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同刘靖基、荣毅仁、郭棣活和刘念义等代表人物见面的。我看参加座谈的人，几乎无一人不兴高采烈。会后，盛康年向我反映情况，他认为这次座谈会很成功！第一是华东和上海的中共领导人，特别是陈总的讲话，可以说是推心置腹，不但不把资本家放在打倒之列，而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，要他们也参加恢复上海经济；第二是这次座谈会，除了几个记者之外，几乎全是工商界；这证明党对工商界的重视。他认为这次座谈会是在请上海资本家吃定心丸，他们可以安心了。

大约是工商界座谈会之后，刘念义忽然到中国银行二楼我的办公室。我问他有什么事？他对我说：“我的父亲刘鸿生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强迫离开上海，他们还迫他去台湾，他不肯，现在住在

香港。父亲认为香港不能久居，想要回上海。你看他能回来吗？”我根据党的政策，当时就回答他：“鸿老在重庆时，我同他早已见过面。他是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人物，我们欢迎他及早归来。”念义又说：“父亲上了年纪，需要人照顾，政府如同意他来，我必须到香港去接他。你看我能去香港吗？我去香港只是为了陪父亲回来，决没有其他企图。”我当场对他说：“你要到香港接鸿老，我完全同意。只要你买到船票，你马上就可以去。”此事我向市委做了汇报。陈总很高兴，说我被得对。那时美国还未对上海封锁，上海和香港的航运是畅通的。

一个星期之后，念义陪着鸿老到中国银行二楼来看我。一见面，鸿老就对我说：“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。我的本意实在不愿离开上海，国民党迫我非走不可，现在回来了，我愿意在上海当老百姓，跟着党和政府走。”我对鸿老表示欢迎，并请他安心在上海居住。没有多久，上海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市委决定请他当人民代表。他接到红色的通知和写有“人民代表”的证条时，觉得突然，就找刘念义去商量。念义告诉他：“好几位工商界老前辈也都接到这样的通知。”他问：“难道他们也是不花钱的么？”念义说：“共产党办事同国民党不一样，人民代表都不是用钱买的。”鸿老对他说：“共产党的政府真是廉洁呀！政府干部并不要钱，如果在国民党时代，我这名市人民代表，非花几根金条不可。”这是后来念义在同我谈话时告诉我的。不久，上海市成立政治协商会议，他当上副主席，遇到讨论问题时，相当认真。陈总和汉年都同他亲切交谈过。1950年2月9日，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之后，他接到特务寄给他的一封信，信里包着几颗子弹，写着：“刘鸿生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”他把信和子弹以及他致市政府的信送到市政府。他的信是这样写的：“陈市长，我过去跟国民党走了几十年，他们干尽了坏事。

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太阳，我决心跟着走，如果你们被迫再打游击，我决心跟你们走。”陈总看信后，叫我去安慰他。他那时害了感冒，住在枫林桥第三个儿子的家里。我是在夜间去探访他的。他卧在床上，一定要穿上棉袄起来。我说：“我们已成为老朋友了，不必客气，你好好休养吧！你的信，你的决心，陈总都知道了，他相信你。国民党是没有能力迫我们再打游击的。”这位曾经当过英资“开滦”煤矿买办，后来转化为民族工业家，成为经营火柴、水泥和呢绒的巨子，扬名中外的 O. S. Tiu，用他的实际行动，证明他是一位爱国者。

大约也是在工商界座谈会之后，有一天刘靖基先生到中国银行二楼找我。他说：“有一件事要麻烦你。”我问他：“什么事？”他说，他和荣毅仁、郭棣活三人，想要邀请市委领导人叙一叙。我说：“这必须请示一下市委才能决定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也是这样想，所以来麻烦你。”在一次市委会议上，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。陈总笑着说：“你提这个问题，提得好，现在就要看我们采取什么态度。你们看吃不吃资本家的这顿饭？”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。黎玉同志特别坚持，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员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，如果我们去吃他们的饭，在政治上划不清阶级界线，就会在政治上丧失立场。刘晓和汉年两同志主张去，理由是我们如果应邀吃饭，就会使上海的工商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接近的，我们同他们的接触是统战工作的一种形式。主张去的和主张不去的，双方热烈发表意见。陈总问我：“你对刘靖基是不是已经答应他们的要求了？”我说：“吃饭事小，阶级关系事大，因此我并没有答应他。”陈总又问：“你是搞统战的，又是工商局长，你看去不去？”我说：“我也做了反复考虑，我认为可以去。他们请客，我们应邀并不是专为了吃饭，这对开展统战工作很有好处。”陈总笑着说：“共产党不怕帝国主

义，不怕蒋介石国民党，难道对资本家就怕起来了？难道吃了这餐饭就会丧失政治立场？难道你们不会利用吃饭的机会去了解他们，去对他们做点思想工作？我带头，你们敢去的跟我去，有工作的，不想去的，我不勉强。”结果，应邀去的，有陈总、刘晓、汉年和我。地点是荣毅仁家里。陈总一到，他们出来迎接，连声说“欢迎”，吃的是扬州菜。陈总边吃边谈，问问他们的业务情况，问问他们对党的工商政策有什么意见？进而用平易简练的语言说了“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”的大道理。吃到10点钟的时候，忽然端上蟹黄包子来。我不吃，陈总问我为什么？我说已经吃饱了。他说：“蟹黄包子是扬州菜中的名菜，不吃是傻瓜。你至少吃一个，这也是开开眼界啊。”大家哈哈大笑，我只好吃了一个。一直谈到11时才散场。这件事传出去之后，盛康年对我说：“你们吃这餐饭，影响很好。工商界的一些上层人物，有的说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有这样的人情味，有的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的动作。”

盛康年当时在上海工商界中是一名活跃分子。他在得到汉年的同意后，便组织一个工商俱乐部，定名为“七一学会”。这个名称是取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日子。俱乐部设在沪西旧法租界的哪条路，我不记得了。但是那座有客厅、有草地、有树木的英国式房子的影子，我没有忘记。他们组织这个学会，是为了学习过去所不认识的道理，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。被请去做报告的，第一个是汉年，第二个是我，至于以后请谁讲话我就知道了。汉年讲的是政治形势和党的政策；我讲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。那天出面接待我的有刘靖基、郭棣活和荣毅仁等人。我对刘靖基说：“我今天要讲的题目，有可能使你们感到在吃辣椒，请大家有点思想准备。”他说：“你的题目一提出，我们就猜到什么滋味，你就放开讲吧。”我就根据《资本论》讲了资本家财富是由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形成

的,但是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明确地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,允许资本主义企业继续经营,但阶级矛盾还是客观存在着,希望他们重视劳资两利的政策。我讲完后,靖公对我说:“你的辣椒并不辣,我们听后还不至睡不着觉。”他们组织这个学会当然不仅为学习,而且是为了娱乐和休息。吴蕴初老先生经常到这里喝啤酒,打太极拳。事隔30多年,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阴谋活动。1952年初,“五反”运动一来,风声鹤唳,盛康年怕了起来,去请示汉年,汉年叫他结束这个学会。他向我哭鼻子,我说:“事情总会弄清楚的,何必哭?就是七一学会解散了,党对工商界的教育是不会放松的。”

二、市工商局和工商联成立

我进上海以后,原来在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工作。到了6月下旬,接管旧社会局并改组为工商处的石英同志奉调参加解放福建的队伍。曾山同志同我谈:“工商处和上海工商界以及市场管理有密切的联系,你对上海工商界情况比较熟悉,现在石英走了,就由你兼任这个处的工作吧。”我表示同意。此时,石英尚未离沪,曾山同志约他到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来,把这个决定告诉他。他很欢迎我去接他的班,并陪我到工商处同蔡北华、杨延修、金瓯卜、邝日安等同志见面,做了交接。在我接管这个任务之前,蔡北华和杨延修同志对接管旧社会局,已做了大量的工作。

旧上海社会局,原由国民党CC系分子控制,机构庞杂,设有8个处和几十个科,还有不少附属单位。它在政治上控制了上海的工商组织和劳工组织,并通过特工系统控制了全市的黄色工会;在经济上贪污受贿,操纵市民的生活必需品。工商处的同志在接管了该局的机构、档案和物资之后,安置了旧人员,改组了工商组织。1949年9月1日上海市工商局正式成立,任务是:工商管理,市场

管理,企业登记,敌产清理,对工商业者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等。人员方面,除了包下来的300多个旧人员外,有接管人员20多人,加上市委派来的有业务经验的地下党员,形成了工商局的骨干队伍。我兼任局长,蔡北华、杨延修任副局长,金瓯卜、邝日安、高云樵等同志分别主管工商管理处、市场处、登记处的工作,刘志诚负责调研室的工作,方行、曹宝贞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。这个班子是相当强的,能担负起当时艰巨而繁忙的任务。

上海解放时,有工商企业16万3千户,职工100多万人,在全国工商业和金融业中所占的比重都很大。上海的工商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具有买办性、投机性和脆弱性。对它们不仅要限制,要打击它的投机性,同时还要扶助它,使工厂能开工,工人不失业,工业品能源源供应市场,城乡物资交流畅通,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,这是我们进上海后十分迫切的任务。

为了管好这个大城市的工商业,就必须了解工商界的情况,这就不能不在调查研究上下点功夫。在军管会工商处时期,我便设立了调查研究组,专门掌握工商界的情况。工商局成立后,这项工作就由调研室负责。我要求他们首先对上海最大的行业——棉纺织工业进行典型调查,对有代表性的企业家编写工商人物志,接着调查主要的轻工业和机械工业。当时由于条件限制,调查工作做得比较粗略,经过一年的摸索,对上海的行业和民族资本家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,因而在工作中起了一定的作用,并为后来编写上海工商业的基本情况和行业调查奠定了基础。

谈起对上海工商业进行的调研工作时,使我回忆起一件往事。1951年初上海市财委(市计委前身)成立,潘汉年同志任主任,我和顾准任副主任,下设几个处,其中工商辅导处是专门和资本家打交道的,除了辅导批发商转业以外,还开展统战工作,联系工商界的

一些组织，收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的资料、资本家的思想动态，这是为了当时调整公私关系、调整工商业的需要。辅导处的联络科有几个干部专门参加一些工商界的座谈会，跑同业公会和国营公司了解情况，出版了《财经情况反映》，每周出版一期，作为内部参考资料，打印成本分送中央和华东、上海的领导同志作参考。当时在中财委当秘书长的薛暮桥同志很重视这个内部刊物。有一次毛泽东同志看到《财经情况反映》后，曾在中央电报中给我一个短信说：“涤新同志，你的材料收到了，很好，谢谢你。——毛泽东。”华东局的同志看到了这份电报，十分注意。饶漱石问我，你给毛主席提供什么材料了？我说：“那是市财委出版的《财经情况反映》，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我都送了，毛主席看到的材料我也已送给你了。”我想，他为什么这么紧张，可能是怀疑我越级反映了什么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怀疑，从此，《财经情况反映》对中央只送中财委和暮桥同志。

因为旧上海的工商业是在帝国主义、官僚资本与封建主义的统治压迫下，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，同时又建立在通货膨胀、商业投机、虚假繁荣的基础上。上海解放后，特别是财经统一以后，以上这些条件起了变化，有些基础也消失了，旧的经济秩序破坏了，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形成，因此上海工商局的工作就格外繁重紧张。每天清晨，薄雾未消，太阳还未上升的时光，旧社会局（地址在旧上海霞飞路马当路口，工商局和劳动局设在这里）的院子里已排了两条长龙，一边是工人向劳动局反映劳资纠纷，工厂发不出工资要求救济和处理；一边是资本家向工商局反映困难情况，要求国家发放贷款，收购成品。这个现象就像医院病人在排队等候挂号看病一样。我们工商局的同志往往从上午八时起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休息，中午吃饭的时间也利用来谈工作。局、处领导干部，在

这时边吃饭边谈工作，有问题大家一起研究，马上向有关方面联系，能解决的马上解决，不能及时解决的也给予妥善处理，一定要使生产能维持下去。那时，每个干部就像在火线上的战士一样，精神抖擞，干劲很大，常常为了工作而主动加班加点，谁也没有怨言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各部门之间互相配合、协作得很好，工作效率很高。这一段历程我永远难以忘怀。

对私营工商业的扶助，从上海解放后的第五天就开始了。收购成品，以原料易成品，如对纺织工业是代织代染，以纱易布，以丝易绸；对面粉工业是以麦易面粉。此外还从全国各地组织原料，如西北的羊毛，东北的木材，天津的纯烧碱等，并用国家银行给予贷款等办法来帮助工商业克服困难。特别是1950年3月财经统一以后，5月贯彻八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的决议，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从临时性转变为经常性，工商局还为此成立了辅导处，配合业务部门，审核加工订货的合同签订和工缴货价等问题，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，逐步把私营工商业纳入了国家的计划轨道。

1950年4~5月间，中财委召开了八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，在会议前后有两件事我记得比较清楚。一是潘汉年同志提出一个建议，他认为单单有工商局长出席这个会议是不够的，还要有一个工商界的代表性人物参加才好，因为他们对市场困难的情况会比我们的干部了解得更加深刻。他提出要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老先生也去出席。对此建议陈毅和刘晓同志都同意，并向中财委提出，经陈云同志批准了。这么一来，天津市的副市长周叔弢也参加了。连在北京的陈叔通、黄炎培等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民主人士也参加了。这次会议不仅解决了工商界的困难，扩大了加工订货，而且成为我们团结工商业者的会议，在这方面汉年同志是有贡献的。第二件事是我动身去北京之前向陈总请示，他明确地告诉我：“中央